

一切以历史的名义^{*}

哈利·何路途尼安

尼采宣称“我是历史的一切名义(I am all the names of history)”(写给雅各布·布各哈特的信,都灵,1889年1月)。这可以理解为,尽管历史有诸多殊途,一切最终同归于现代性。^①现代性并不实际存在于任何地方,其受到广泛认可的特征之一是,作为现代之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将之前的历史都预设为已被超越的历史。马克思也认为,事实上,现代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它之前的历史无非是它的前奏,前资本主义的构型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序幕。^②在这种观点里,历史只是预设中通往现代性的必经之路,而现代性则成为“历史的一切名义”。对于尼采而言,现代性是治愈席卷19世纪欧洲“历史之病态”的良药,以治愈“过剩的历史意识”。这种“过剩的历史意识”妨碍了创造力,并迫使社会从由过去演变而来的“假面具与戏服的大仓库”^③当中选取文化。即使在尼采之前,我们应当记得马克思阴郁的判断:18世纪晚期的

* 本文译自 Harry Harootunian: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之序章。征得作者同意,删去了序章最后的两段。(编者注)

①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p.165, 1988.

② Kristin Ross, “Watching the Detective,” in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reading of Modernity*, ed. F. Barker, P. Hulme, and H. Iver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9-50.

③ 同注①。

政治革命未竟“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之功，就仓促停止，“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①

对于尼采来说，解决之道是在文化内部找寻“超历史”或者“永恒”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既可以制止使创造性窒息的过度的历史，又昭示了一个新起点的“再生”。意料之中的是，在日本，这种对历史及其所创造的伪文明的现代主义憎恶也有其先驱，他便是高山樗牛（1871—1902）。^②在其1902年发表的《论美的生活》一书中，高山樗牛用了尼采批判欧洲小资产阶级文化的阴郁语言，对明治文明加以痛责。^③和生活在明治末期的同时代人一样，高山所针对的是日本新文明的肤浅性，它投身于机械，金钱以及物质性，醉心于一种衍生的、显然属于他国历史经验的文化、艺术、建筑和时尚。高山对庸俗性、枯竭的创造性以及文化模仿的富有洞见的批评预示了20世纪30年代对文化精神的捍卫以及对明治文明的大规模反思。这一切最终形成一种社会言论，它专注于确立文化本真性的基础和原创性及创造性的源泉。然而现代主义的表征之一就是，通过“超克”，通过消除社会对作为现代社会驱动力的、对新奇和变化的永不止歇的迷恋，通过消除支配历史文化的无可消解的不确定性幽灵，来达到稳定价值，并将之永恒化。

尼采指出，由于过剩的历史意识忠实地记录了相同者（the same）的时光流转，欧洲文化的创造性已经走入末路，他抨击同时

① Karl Marx, *Eighteenth Century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15.

② 高山樗牛（1871—1902），明治中后时期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批评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鼓吹日本主义，再后来信仰尼采哲学。明治三十年（1897），后信奉日本佛教日莲宗。高山在明治中后期对知识青年影响甚巨。（译注）

③ 《日本现代文学全集第8卷·齋藤緑雨集·石橋忍月集·高山樗牛集·内田魯庵集》，286~291页，东京，讲谈社，1967。

代人借用了过往的面具与戏服，而日本的评论者也认识到他们采用的文化，是对模仿者的模仿，是物化的物化，是套在另一张面具上的面具。这是所谓工业后发者都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难题。工业后发者总是姗姗来迟，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开始了清算发展价值和转向超克逻辑的过程。后面我将讨论把日本视为“迟来者”或者“后发”社会这一观念的问题所在，在这里，应予以指出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人的认知激烈地摇摆于两极之间，一方面意识到被现代性凌驾的祸殃，而一方面又看到超克现代性的不可能完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社会引入了由电力和机械生产驱动着的新兴科技，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转变。到1918年，日本城市遍地是大型工业地带，涌入大量来自乡下的劳动力（其人口迁移速度之快一定创下了某种记录），整个国家投身于供大众消费的商品生产。这种经验，在短短20年间迅速建立了日本人所说的“现代生活”，它被积极地描述为日本被现代性征服的时刻。然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又投身到一场战争中去，敌人是那些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之并肩作战的工业社会。1942年，日本最卓越的思想家，批评家和艺术家在京都发起了一场专题讨论会，试图系统地评价近年来现代化经验的意义以及如何超越和克服现代。

本书关注的是日本如何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即批评家柴田胜卫在1918年所描述的“攫取了时代之民心的某种本质上的东西”，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键的20年里日本人是如何反思“现代生活”的经验。本书并不是要恢复这一时期日本人的现代性经验。真实，就其本身而论，并不能透明地表现在社会史的叙述当中，相反，本书关注的是这种经验是如何被思考，被讨论的，以及同时代人如何回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这一历史时刻是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化为特征的，而资本主义现代化众所周知始于19世纪明治政府改革派的推动。然而，日本原本只是专注于轻工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日本决定参战并加入，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转向了由新兴力量驱动的重型工业与资本工业了。拜战争与新型生产力量转型之所赐，就发展指数而言，日本转变成为紧随美国之后，堪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比肩，而又超越了意大利

和苏联的工业国家。泽田健在他 1923 年发表于《中央公论》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日本的城市化反映了工业化的转变,其程度比起世界主要国家来也毫不逊色。泽田援引人口数据与人口流动为证据,指出日本的经济规模开始与成熟的工业社会齐头并进。所不同的只是扩张的形式,日本的城市化采取了横向发展的轨迹,而西方社会的城市发展则表现出垂直的倾向。当人们“造访摩天大楼林立的曼哈顿,免不了慨叹:‘欧美城市参天直立,而日本城市则平铺遍地。’”^①

泽田的观点虽然得到同时代时评家的普遍的支持,但却与后来建构在“后发者”这一范畴之上的史学及社会学阐释相龃龉。这一阐释认为,日本效尤德国、意大利,最终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转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未能像英法一样发展出成熟自由民主的机构,大概是由于英法的现代化发生的更早,因而持续得更长。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都把后来者或者后发展社会当做经济先行,政治落后的畸形发展的实例(包括法西斯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且造就出由于缺少必要的机构而无法遏制地滑入政治集权主义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这种论述将时间上的数量差异上升为本质差异。但是后期发展者这种阐释故意不谈的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或是经历了法西斯运动,或是表现出清晰可辨的与法西斯主义相关的智识文化上的特征。^②有趣的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了

① 泽田谦:《都市与逆反》,鹿野政直编《近代思想大系·34·大正思想集 II》,270~289 页,东京,筑摩书房,1977。

② 柏辽金:《法西斯自我的创造》,(Mabel Berezin, *Making the Fascist Self*.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页。没有一个政治术语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引起了如许之多的历史学上的焦虑,招致了如许之多宣称其定义与含义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说法。读者应当参考 Stanley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194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这是近期以来对法西斯主义最详尽的讨论,包括了欧洲之外的法西斯主义,比如日本的经验。这本书资料翔实,但是对于法西斯现象的普遍化稍显犹豫,似乎在暗示,经验的特殊性显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实在是不可企及。然而这种历史学上的小心谨慎,其危险之处在于,它允许了这样一种简单的假定:我们误把别的什么东西当做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

经济力量所扮演的支配性与特殊性的地位，因此促发了一种将其他因素排除在外的经济至上主义。在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一论调被延伸到对帝国主义本身的评价当中去。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尤其是现代化与新现代化（当下被称作全球化）的支持者当中，时间滞后理论催生了一种经济政治的模式，基于此种模式，西方的历史经验（美国，法国和英国）表现为一种基准规范，这些社会通往现代性的道路被认为是足以发展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诸般制度，并且可以避免大规模的革命剧变。在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我不会排除如“世界体系”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变奏）看来，后期发展是“帝国主义之桎梏”（借用尼克斯·普兰查斯的话）的结果，“帝国主义桎梏”将边缘区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置于中心区域的股掌之中，而中心区域则由主要的工业国家组成，其扩张需要新市场，大量的原材料，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然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而将之视为简单的经济现象——垄断与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兰查斯，回归到修正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试图指出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其主要起因既不是后期发展的经验，也不是经济危机。虽然这些因素在帝国主义的整体构成当中举足轻重，“作为这一阶段一种可能的历史聚合点的要素”，法西斯主义并不能仅仅还原到这些原因。^①“帝国主义……实际上并非是修正经济领域的问题，譬如垄断集中化，银行与工业资本融合成为金融资本，资本的出口，单纯以经济为目的的殖民地扩张，以及凡此种种。这些‘经济’因素实际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系统的新构成，由此造成了政治与意识形态上深远的改变。”^②在这种观点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线性

历史特定的外观意味着它不可能在别处出现，也不可能再一次出现。我们可以在三木清的文本当中看到这样的论调，我们将看到，三木清试图对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意大利变种加以批判，以疏远他自己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概念，而三木的概念本身与他所无视的有着惊人的相似。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精力耗费在根本看不到的主题上。

① Nikos Poulantzas, *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London, Verso, 1979, pp.17-19.

② Ibid, pp.19-20.

后继者(京都学派哲学左派的户坂润^①早在普兰查斯之前就看到这一点),相反,法西斯主义起因于复杂多变的阶级联合,在其初期阶段征用民众支持的模糊特性,情愿接受“妥协措施”以支持多种多样的阶级愿望与幻想,而最终,法西斯主义走向了清除自身的阶级起源,甚至阶级本身,转而与大型商业联合。转向法西斯主义,我们将看到,创造了一种与资产阶级的祈愿相呼应的意识形态,青野季吉^②在1930年先见性地观察到这种意识形态(权力崇拜,强大国家,对民族文化的极度关注,财团主义与权威主义,技术官僚政治,以及不可或缺的军国主义)正与帝国主义相匹配。

由于把经济至上主义置于一个特殊位置,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叙述都同意的一点是,后期发展国家,诸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发起的经济发展牺牲了作为媒介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可以抑制国家过度干预的市民社会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隔。对于现代化论者来说,基于一种进化的线性的增长模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个人权利的重新组合,将会带来一个自由民主秩序的建立。古旧的文化价值被用来协助看起来是完全自然的向新社会构型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境下,传统价值是由它们能否适应进化的新条件来加以衡量的,因此,或是表现出它们的适者生存性,或是在必要的调整面前无能为力,随着社会迈向更高的阶段而消亡。而马克思主义者,姑且不论他们内部的纷争,看到了作为灾难迹象的不均等性——现代化社会中的封建残余——这一充满了革命潜势的社会矛盾。对时间滞后的中心性的强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近乎一种拜物崇拜,它建立在单一而规范的时间性这一假设之上,两种叙述都提请我们对每一个民族经验之特殊

① 户坂润(1900—1945),京都学派左派的代表性哲学家。1922年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早年为新康德哲学的信徒,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并创办了“唯物论研究会”,1934年被免职后专门从事著述。1937年被“禁笔”,1938年因唯物论研究会事件被判刑,1944年入狱,次年卒于狱中。(译注)

② 青野季吉(1890—1961),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为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从1920年起,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为早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指引了方向。(译注)

性加以注意。在此我所指的是，单一而规范的时间性可以表现出一个社会在发展的轨迹上所处的位置，以及要迎头赶上它还要走多远。然而，这样的距离也促使后发展社会寻求与西方价值近似而匹配的文化价值，这些价值被看做是帮助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社会。这意味着，单一而规范的时间性常常寻求一种比较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中，能迎头赶上的后发者被看做是例外和特殊的，而那些未能表现出发展能力的，则被认为是缺乏所必需的文化手段，因此被锁入无时间性的地带。把进化增长置于特殊地位的现代主义者曾经都无一例外地突出强调了从过去存活至今的传统文化价值、制度以及实践的重要性，现在他们又在讨论新方向和新定位。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研究当中有一股强大的学术舆论，认定日本之所以避免了中国与俄国社会的暴力革命之路，正是因为那些可以顺利应变新情况的永恒价值发挥了调和及改良的作用。当然，这种旧价值适应新形势的灵活能力也表明了他们的适应性。^①

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这些苟活下来的残余统统被称作封建余孽。它们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的出现构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由旧秩序残存的元素与新的政治形式结合起来的当代权威结构，在不远的将来将不能再遏制这些社会矛盾。^② 和现代化论者如出一辙，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共存意味着现代经验是例外的，和其他历史的模式无关。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与马克思主义者，如瓦尔特·本雅明和厄内斯特·布洛克，所谈到的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现代和现代化的经验完全一致。布洛克先见性地看到，即使资本主义信誓旦旦地承诺最终将在它所及之处创造平等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却无法避免导致不均衡性出现的命运。对于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性，日本马克

①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帕尔森效应，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和克里夫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曾经颇具说服力地将之概念化。

② 我受惠于阿诺·梅耶（Arno Mayer）的卓越而又富于启发性的著作《旧秩序的坚守：通向世界大战的欧洲》（*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1），这一概念确实表达了截至“二战”前的日本政治社会史的特征。

思主义的阐释常常冒着与尖锐的极端民族主义阐释相类似的风险,后者不顾铭刻在同时代政治文化之上的极权主义阴影,而醉心于把国民性表现为独一无二并且例外的存在。他们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进程来加以关注,反而聚焦于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形成,由此暗示了一个在引进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家,并且把种族民族作为最本质的分析单位置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殊不知国家只是资本主义最新的历史形态。

这两种叙述都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日本的现代性,然而这种理解的代价是,它只进行特定的历史研究,譬如由经济带动的社会/政治史,而忽视排斥了其他形式的历史研究。对日本现代性的理解则把结构、制度与运动置于首位的重要性,而思想与经验则退居其次,仿佛这些都是独立存在的。在这本书里我将明确地聚焦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与文化的问题,以及这两者之间交互的重叠。我想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如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京都学派哲学的三木清(1897—1945)^①以及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1897—1962)这样差别如此之大的思想家们,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下的书写,竟会碰到同样的难题:即阐释政治与文化、经验与可能性、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了解了他们是如何思考这些关系可以进而理解他们的时代,并猜想他们对当今世界将如何反应。从本雅明为人所熟知的把同时代法西斯主义转向“审美化的政治”的声明,到三木清几乎同一时间宣告的当日世界最首要的问题是持续的“文化的政治化”,我想,我们能发现一个被大部分历史书写有意忽视或视而不见的经验。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试图避开普遍流行的叙述当中的逻辑。这种逻辑频繁诉求于后期经济发展的比较经验,并将它当作不变

① 三木清(1897—1945),日本京都学派左派哲学家,在京都大学从学期间师从京都学派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922年起留学德、法等国,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回国。留德期间则师从海德格尔。哲学立场上偏向人道主义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人注目。1930年以向共产党提供资金为由被捕,出狱后从事历史哲学的研究,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轨道。1944年被控窝藏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友人而被捕,战争结束之时病死于狱中。(译注)

的因素用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历史及其与西方工业社会的不同之处。理解这一逻辑的设想尤为重要。如我所示,现代化的策略以西方社会的基准经验作为对照来看待发展,追踪像日本这样后来者的不同位置,评价它们由于迟来一步而造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代价。这样的情境预设的是,不论一个社会开始于何时何地,资本主义都将在社会内部带来一致的发展,在不限期的未来的某一时间建立一个均等的基础。因此,这一阐释的策略几乎完全聚焦于不同社会之间的不均等性,将这一不均等性看作是相对发展的指标,而忽略了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均等性。这一策略有效地取代了常常伴随着资本主义左右的巨大的结构性的不均衡,和其“最深处的矛盾特征”,以及它常常陷入危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①进一步说,为了说明政治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性,这一阐释的策略往往完全忽略了明显可见的文化领域里不均等性的标志。

事实上,资本主义并没有常态,而是处于接连不断的扩张当中,而扩张的延续需要永久性的过剩和剩余的生产。持续扩张的代价之一就是创造了永久的不均等性,创造了社会形成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永久的不均衡,在这一过程当中,某些区域要为其他区域的发展做出牺牲。譬如,柳田国男注意到的,在日本转型早期,乡村对城市的牺牲。其他还有诸如殖民地对宗主国的牺牲,甚至是一个城市对另一个城市的牺牲。借用德勒兹和伽塔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永不停歇地一边去疆域化,一边使去疆域化的再疆域化”。在这一点上,均等发展这一必要的幻象被概念化了。由于对阶级对抗和社会矛盾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内部不均等性的幽灵表现出了更多的敏感,尽管如此,他们也常常像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论者一样,将不均等性当做全球背景下比较发展的标志,最终将被全面的均衡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所消除。为了避免因噎废食,本书将致力于把不均等性置放于国内社会之中以评价不均衡性对处于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互动中的文化生产所造成的影响。

然而,时间滞后理论真正重要的结果是,它投射出不同地带或经度存在着不同时间性这样一种印象。在这里,人们相信真实的

①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9.

时间是由现代西方来记录的,因此时间性是由一个基准的时间线来衡量的。这意味着,对日本及所有殖民化社会等所谓的全球后发者来说,存在于一个不同于现代的时间性,它们处于增长的停滞状态,不具备成熟性,因此亦无时间性可言。正是这样的时间滞后造成了不够现代(往往是“不够白”的委婉说法)的现代性想象,创造出了常常是荒唐无稽的新类别,譬如“他种现代性”,或者是区别于现代西方时间性的回溯型现代性,这些新类别允许我们能够把日本这样的社会安全地放置于源起于他者发展的历史轨迹当中。

在这本书里,我想要表达的是日本的现代性实际上并非指向实现真正时间(仿佛就真的存在一个关于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那么什么才是现代化理论),而是更为广阔的全球进程中的一个变调,这一全球性的进程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共存的或者共时的现代性(co-existing or co-eval modernity),它和同样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性享有同样的历史时间性(作为历史性总体化的一种形式)。我的概念与“他种现代性”或者“回溯型现代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看到共时的现代性唤起我们对共享同一时间性这一经验的注意,无论一个社会是以怎样的形式发展的,它的发展与其他的现代性都是发生于同一时刻。然而,这一经验又必然标志着差异。“他种”现代性这一构想带来的问题是它不言而喻地预设了例外主义和唯一性。对于形容词“他种”的诉求不仅仅意味着差异,更意味着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共时意味着同时代性,而又包含着差异的可能性。^①这种差异构成了其他地方——譬如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地位,作为后期发展者的巴西,以及印度这样的殖民地社会——的现代性经验的特征。它也反映了本土与被接受的文化习惯——作为参照物的文化——之间的磨合,以及资本主义扩张这

① 参见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4 页。在这里詹明信主张要有更为广阔的“现代主义及其文化的比较社会学”,与韦伯勾勒资本主义与世界宗教之关系的早期尝试极为相似。佛朗兹·法农曾经指出,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摧毁了旧的“参照体系”,“洗劫了文化模式”,“夸耀”价值,而又“捣毁”、“掏空”它们。F. Fanon, “Racism and Culture,” in *Toward an Af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p.33.

一新的全球性进程的必要条件。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现代生活”的经验构成了一种二重化，它修订了现代化历程可以毫无疑问地发生在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地这种历史反复的逻辑。思想家与作家们把日本的现代性描述为一种二重化，它铭刻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的新需求，以及被接受的历史与文化模式的力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尽管这种二重化的概念往往被看做是日本现代经验的独特标志，而二重化的逻辑却指出，其他地方的现代性经常导致哲学家和辻哲郎所称的“二重生活”，以及厄内斯特·布洛克(Ernst Bloch)将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德国生活所描述为“非同期的同期性，非同时的同时性”。两人都指出几个过去与现在，往往以一种不均等的关系，同时存在于日常性的当下。^①两次战争期间的很多思想家都通过种文化分析的形式来检视发生在他们眼前的现代生活的奇景。

如果我们知道日本由于转向有能力为大规模消费生产商品的重型工业与资本工业，而经历了日益增长的质量与数量上的转变，日本社会的外观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已经大为改观，我们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它给予日本“现代生活”的影响。这意味着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模式，而这种特殊的经验模式也并非像很多历史学家所相信的那样，只能还原到经验主义的领域。与其把日本社会的物质形态转变当做某种假定的社会概念来加以检讨——恰恰是社会与政治史的课题与主旨——我们更需要把这个片段解读为试图握住移动的现在(正如波德莱尔将现代生活描述为“短暂的和碎片的”)的经验生产，并因此赋予它意义与方向，而不是将其视作历史叙事中正统的、常见的情节。同样地，我们需要说明在这期间，为什么日本人思考了如此之多，希望对这一物质转变的经验达到一个哲学性的理解，而不单单是社会学的或是经验

① Ernst Bloch, *Heritage of Our Times*, trans.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37-185。这本书写于 1930 年代早期，于 1935 年出版于慕尼黑。布洛克引介“不同时的同时性”这一概念，来解释纳粹意识形态，它依赖于遥远的甚至是神话的过去与工业的当下的共存。这一重要概念的缩写版本，可以参考 Ernst Bloch, “Nonsynchronism and the Obligation to Its Dialectics,” *New German Critique*, No.11, 1977, pp.22-38。

的理解？为什么这些理解与阐释的词汇绝大多数是哲学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为什么，像户坂润所说的，“日常性”必须被看做是一个哲学概念才能理解现在的“现代生活”。虽然户坂把诠释学的实践（尤其是针对他昔日老师西田几多郎^①）当做资产阶级哲学而大加挞伐，他本身对现代经验的方法却也正是哲学的和阐释的。

尽管如此，在我们转向这个问题之前，仍需讨论标志着日本进入加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关头，以及它产生的背景的力量。在大正·昭和前期（通常冠之以天皇年号，大正即 1912—1926 年；昭和即 1926—1988 年），日本社会经历了高涨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扩张、资本的积累，也因此在许多主要指标上显著增长，与大部分工业社会相去不远。^②在历史上，日本社会被战争和急速的向重型工业化的转型所改变。在阿诺·梅耶和佩里·安德森看来，战争与大面积的工业化昭示了一个全球历史时刻的到来，在此时刻，“不同的历史时间性汇聚而构成一个超定的场域”。^③毫无疑问，这一历史时刻是由战争以及后来和平时期转向大众消费的产品生产而引发的。在政治上，日本社会的特点表现为，虽然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以及财阀这样的新阶级的兴起，梅耶所说的旧秩序——根植于土地支配的半贵族阶级——仍在“顽抗”。战争期间及其后，日益意识到权力被剥夺的新兴社会要素与阶级开始积极地要求改革与革命，挑战了现有的权力安排与秩序。在日本，这一激变与“大正民主”同时发生，由劳工运动、乡下的佃户联合组织、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领导的新式的激进的以及不那么激进的政治运动，都要求扩大政治选举权与政治参与，并且进行社会改造。然而，在日本，这一事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并未消退的前资本主义的过去，与资本主义

① 西田几多郎(1870—1945)，京都学派哲学代表哲学家，也是近百多年来日本的代表性哲学家，他以佛教哲学、阳明学为基础，融合西方哲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译注）

② Nakamura Takafusa, *Lectures on Modern Japanese Economy*. Tokyo: LTCB International Library Foundation, 1994, pp.1-128.

③ Perry Anderson,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324.

和工业化共存于一个生活着大量城市居民的不确定的当下,并最终成为思想家们试图基于已然改变的世界而想象的、但实际上无法构想的未来。^①

构成这一全球时刻的是这样一个坐标:处于急速的工业化过程中依然负隅顽抗的占优势影响力的农业政治秩序,在此秩序下的半贵族式的统治阶级(在日本,由天皇、宫廷以及诸藩元老代表),以及肇兴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初期的劳工运动。在日本以及其他地方,尤其是勃兴的大都市如东京、大阪(也不能不提柏林、伦敦、巴黎、纽约),标志这一时刻的正是清晰可辨的“现代生活”的诞生。这种“现代生活”常常被视为是日常性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大规模政治经济转变使之成为可能。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现代性被看作是永无止歇的变化(历史发展的叙述以及资本主义扩张的法则)以及不确定性的幽灵。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历史文化不再具有确凿的价值,而变成了幻想与欲望。在德国也存在类似现象,思想家格奥尔格·西美尔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最先对此做出了反思;在法国则体现为两次大战期间所迷恋的“美国化”;在日本,对现代生活的关心更是左右了一代知觉敏锐的思想家、作家和学者,他们尝试着理解现代性的奇妙景观——处于无休无止变化洪流中的新体验——并且估量现代性的不稳定性力量的意义。思想家与作家关注的是这种“新”的体验及其对固有社会关系、新阶级、主体性、性别特征带来的结果,以及欲望的生成如何威胁削弱了作为参照的文化。克拉考尔的《工薪阶级》(*Die Angestellten*, 1930)完整地勾勒了德国“白领阶级”消沉的期待和与日俱增的焦虑,这种情感是由一种无家可归感和对“庇护”的寻求激起的。同时,日本的批评家青野季吉发表了他的《工薪族:恐怖的时代》。虽然青野的文本与克拉考尔的书同时出现,又针对的是相似的主题,并且二者都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同情,然而青野的文本与克拉考尔的书毫无干系,青野所要表达的是

^① Perry Anderson,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324-326.

日本中产阶级工人所经历的恐慌。

把握这样一种经验，它足以在一个日趋被均质化和同质化的世界当中，抵抗变化的侵蚀，并提供一个稳固的认同（差异）。最终，以这样的关怀为方式，将两次战争期间的历史问题加以重新编排。通过聚焦于历史剩余和过剩的景观，以及在变幻不定的场景下对本真而坚实的基础的寻求，话语指向了“现代生活”这一突现的制度以及它所造就的根植于商品文化的大众消费之中的经验。换言之，在西奥多·阿多诺看来，战后世界的状况对 20 世纪 20 年代率性随意的承诺欢迎备至，甚至是额手称庆，也制造了“萎缩”、“中立主义”以及“对死亡的罪恶感”等等现象，它们把造成后来出现的普遍恐怖与压迫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阿多诺观察到：“这些现象在自由主义的欧洲社会内部构成……”^①，然而同样的事在日本也发生了，在那些年里，关东大地震，无数朝鲜工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被杀害，投入到大陆帝国主义当中去，以帝国正统性为名目而登场的军国主义，凡此种种接踵而来。在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加速，以及自由主义的短暂高涨，联合起来掩盖了明治维新未能实现的社会革命。然而，在户坂润看来，社会革命虽以失败告终，其实已经铭刻在明治日本所开启的资本主义结构（私有财产制度）和自由主义当中，自然而然地，洪水的闸门已经打开，每一种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都被纳入日本多元化的保护伞之下。^②因此，造就了现代主义者回应大爆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也植入了“积累法西斯主义”^③的基础。

当我提到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者的时候，我对这些词汇的使用并不局限于美学的标识，而是把它们当做不仅包括了文学艺术，更是把哲学宗教、社会政治思想囊括其中的意义更为广泛的能指（signifier）。在我这里，现代主义更是日本所经历并试图加以把握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转型（transformation）之意识形态化。尽

① Theodore Adorno, *Critical Models*, trans. Henry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1-49.

② 户坂润：《日本意识形态论》（户坂润《日本イデオロギー論》），99 页，东京：岩波书店，1977。

③ Alice Kaplan, *The Reproduction of Banal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管日本的现代主义与更广阔的全球事态相一致，它同时决定性地标志着一个区域的过去与工业化同时存在这样一种差异的模式。在这样的理解下，也许现代主义应当被准确地归属为一个复数性的概念，而不是单数性的，正如法西斯主义应当表达为多种多样的，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涵盖一切的模式。但是，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对现代主义的定义与解释也是言人人殊。常常被视为是“学术”的古老的文化模式与仍然有效的过去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了现代主义所针对的目标，现代主义认为，形式的稳定性被无休止的变化削弱了。古老的文化模式同时不断地提供资源，动员起来以反抗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市场带来的毁坏与物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市场已经开始担当着组织新的社会关系、认同以及价值的基本原理了。阿诺·梅耶(Arno Meyer)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矛盾：在现代主义在19世纪欧洲出现时，新兴资产阶级醉心于收集古典艺术，“收购或兴建‘古意盎然’的乡村庄园和城市公馆，赞助传统表演艺术”，而不是“促进”并且欣赏现代的求索。移用古旧的文化模式，其作用是重申了“不相称地定向于前工业和前资产阶级的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官方文化”。^① 尽管前卫派(avant garde)容易令人联想到其消解历史、蔑视历史，但是，过去，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为现代主义对抗异化(物体化 reification)的废墟所尝试的再表现，提供了隐喻的仓库。这些对抗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者，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称，以吊诡的形式，在历史表象当中寻求庇护，以免于日常现代生活的异化效应，也因此为最宽泛意义上的艺术和文化赋予了绝对价值，这样的绝对价值不会受到市场和政治世界的价值变化之影响。因此，日本的现代主义寻求抵抗资本主义文化(安德森提醒我们，大部分现代主义者都有着对市场的憎恶感，他应该加上，大部分现代主义者在接受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以及社会影响排除在外)以及正在兴起的现代生活，这一现代生活本身也不断经受着诸如革命性生产过程、长期的国民冲突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的猛烈冲击。归根到底，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现代主义形成于这样一种局面，它认清了领域广阔

^① Mayer,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p.192.

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均等性,并试图将之加以解决、克服,甚至是抑制。也就是说,现代主义试图逃避历史,而同时又诉求于本真文化客体的古旧的历史再现,并希望以此种方式把抽象性和分裂性置换为具体性和整体性。

现代主义正是不均等发展的历史标记,不均等发展是它的主要标志,尽管它试图抹杀和抑制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我已经谈到资本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惯常的、平衡的状态,尽管资本主义宣称在不确定的未来它终将达到这样的状态。虽然早期明治政府努力通过以加强对市场价格的国家监管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市场的自由发展,倾向于将经济置于政治管理之下以期控制商业周期,日本的资本主义也并不构成一个例外。然而,即使市场受制于国家,政治在上而经济在下,日本社会也并不能完全不受到固有的体制内的结构性不平衡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问题尤为凸显,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大起大落,到达顶点之后终于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大萧条轰然倒地。^①由于资本主义投身于实现无限扩张和过剩生产,因此它面对着持续不断的积累危机,它存在的条件不断被革新,并且不断地制造着不均衡性。增长也就意味着一些区域总是要为另一些区域的发展做出牺牲。这种不均衡的经验,在日本和其他地方都被视为是一个轨迹上无可避免的暂时阶段,并最终实现不同领域不同社会的均衡发展。然而,如果不把周期性的危机都解释为更宏大的资本主义叙事中的小标志,那么这是一个必要的意识形态的宣言,它为无限的扩张、剩余的生产以及过度的欲望而声辩。对于正常而均衡的状态的推想是一个必要的虚构,换言之,它的承诺只能在无限期的未来里实现。就这样,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标榜为工业世界之中心的先进国家可以将他们的本国不均衡性出口到国外,因为他们知道不均衡性是资本主义永恒的常态,而不是简单短暂的历史阶段。他们可以将他们本国的不均衡性出口到国外,转嫁到殖民地或者像日本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化的进程远远晚于西欧和美国

① 中村隆英:《现代日本经济讲座》,3~50页。

(今天一些作者在第三世界看到了永恒的不均衡性的幽灵,他们更应该仔细检视他们本国内不均衡性的迹象。))。

政治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里的不均衡性的奇景构成了这样一种现代主义,它不仅有能力抑制这一经验的种种迹象,更有能力完成一个进步的现代社会,在这里,古老的残渣余孽,甚至是“历史的感觉”,都被涤荡一新。考虑到现代主义与这一“不同步的同步性”(布洛克语)之间的关系,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现代主义看作是一个阶段,已经随着后现代性的建立而历史性地被超克了,詹明信把后现代性的特征归结为比现代主义更现代。^①然而,这样的肯定将较早的现代主义与不均等发展等同视之,看作是暂时的历史阶段,迟早会有更完满、更均衡的发展继之而起。在日本,这种形式的现代主义先是用以压制政治经济领域(时间的)和社会文化领域(空间的)的不均衡性的诸多表征,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又转型为超越和克服现代的号召,而现代正是最初使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不均衡现代主义的“历史阶段”。它试图掩盖不均衡性的灾难征兆,并指出在真正的现代社会里这些终将被消除,同时也揭示了在与政治经济连动的文化/美学领域这种不均衡性也是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日本的现代主义把文化从政治经济领域移除开来,并宣告了文化的半独立性,也因此使它免于被商品化。由此,它宣告了文化(空间的)与政治经济(时间的)之间一种不同的不均衡关系,并且建立了一个免于受到商品形式影响的范围,一个可以对占优势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展开批判的空间。然而,我后面将会谈到,对文化和共同体主义的诉求恰恰是商品形式的逆转。在一个层次上,这一空间—文化/美学的转向代表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祈愿,它试图标识出一个尚未被商品所污染的区域;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是意识形态—社会抽象的乌托邦的阴影。在此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提供了通向现代主义的内在路径。

对文化与共同体的诉求,也正是从这种社会断裂的过程中派生而来的,而这种断裂是由劳动分工、异化以及“半自治”和“分割

^① Jameson, *Postmodernism*, p.310.

化”领域的建立造成的。1942年“现代的超克”的研讨会把这些变化归结于重大的知识分界和领域的专业化。社会生活渐进的断裂把“生活的时间”与被商品化的钟表时间、或者说是以金钱衡量的时间性之间的差异戏剧化了，复古的回忆对于现在生活常规的对抗仍然随处可见的，感知也和主体分离，明治时期著名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1875—1962）^①在《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中指出了“观察世间的双眼”的重要性。^②柳田谈到，演员上山草人在好莱坞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回到了日本，他发现东京人的目光眼神变得“非常可怕”。这意在说明由于个人的位置不断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常常要求“反复地”注视着现实。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乡下，人与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几乎不会有目光交流，因为他们完全认识从身边走过的人。为此，柳田建议重新思考那些习以为常而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古旧的色彩和声音。^③在这一点上，詹明信认为，对“新”的认知，只有在现代实践与古老习俗之间的不断对照之下才能成为可能，在这里，“新”被认做是老旧、标准、惯例的反面（此种观点塑造了柳田关于明治与大正社会的著作），在这里，过去与现在、千变万化与一成不变不安地交杂在一起。^④在《论废墟》这篇富有洞见的文章里，格奥尔格·西美尔指出，残留下来的过往紧挨着新颖现代的建筑、街道和场址，被安置在同样的风景下，这样的反差造就了一种敏锐的意识，理清了新与旧。“新”之所以被体验为现代正是由于古老与陈旧仍然历历在目。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江户川乱步创作于二三十年代的侦探小说常常用到三角恋爱关系的主题，其结果是以女性的悲剧告终，这些女性由于超出了民法典（Civil Code）与大众意识形态赋予她的角色，而付出代价。虽然在

① 柳田国男（1875—1962），毕业于东京都帝国大学，为日本民俗学之父，并从民俗角度建构日本的历史、文化叙述，构筑日本的文化认同。他的著作对后世影响甚大。（译注）

② 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187～190页，东京，讲谈社，1993。

③ 同上书，19～22页。另请参考 Fredric Jameson, *Fables of Aggression: Wyndham Lewis, the Modernist as Fascis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14.

④ Jameson, *Postmodernism*, p.310.

现代生活当中女性已经生活得更为独立自主,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她们仍然被迫提示着古老与传统的存在,而男人则总是生活在“新”当中,仿佛这是他们天赋的权力。^①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德永直(1899—1958)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经历的不均衡性的窘境,以及社会矛盾怎样成为“现代生活”的永久烙印。在《没有太阳的街道》当中,德永笔下的一幕清楚地说明了在物质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新与旧的深刻融合。在对街道——20世纪20年代日本现代生活的象征——的重要性的描写中,他捕捉到了活生生的不均衡的瞬间,捕捉到了处于日本现代经验之核心的不同时间性之间的碰撞:

电车停了,汽车停了,自行车也停了,甚至是焦躁得快要飞起来的挎斗摩托车也停了。发生了什么?出现了什么?苍白无力的十一月的太阳底下,人头涌动如沙尘暴。如水池里的蝌蚪一样的人流,推挤碰撞,开始游开来。前方皇室通行,重要人物拜访摄政宫殿下。前排的耳语立刻传到了后排。摩托车止歇了引擎声,人们脱帽致意。

德永的笔下的场景展现了作为现代象征的街道上紧张的一瞬间,涌动的人群,嘈杂,混乱,一时间,由于天皇扈从的经过,像急刹车一样停止了。它直接呈现出强大的共存:作为遥远的农耕社会的古旧残余的天皇制在这一刻沉淀在现代十字街头的中心。^②换言之,“新”不断击打着“旧”,在它们各自的主张之间寻求和解。然而这样的冲突似乎立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时间的问题,市场有能力有效地冻结历史的瞬间,把生活的时间置换成无时间的商品行列。诸如此类的境况促使身处异地的本雅明观察到“流行是‘新’的永恒循环”。^③

① 松山巖《亂歩と東京》, Tokyo: Parko, 1984。

② 山本明:《社會生活の変化と大衆文化》《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19卷,306页,东京,岩波书店,1976。

③ Peter Nicholls, *Modernism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7; W. Benjamin, “Central Park,” trans. Lloyd Spencer,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4, 1985, p. 46.

在实现现代主义计划的过程中,日本人经常借用了遗迹与残余所代表的形形色色的过去,无声地暗示着不同的时间与经验。与无休止的变化大不相同,这些遗迹无意识地唤起了一种被认为是完整而一致的生活瞬间,它们也因此免受市场与“流行癖”的侵蚀。由存活下来的残余代表着的过去,就像西美尔的“废墟”,预示了一种存在于不同构型中的生活与经验的前景。存在于工艺品、习俗和庙宇之中的过去,证实了前资本主义的源起,以及它有能力抵抗“‘新’的永恒循环”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抵抗商品形式的世界,抵抗资本主义体系的交换价值所带来的社会抽象的体制。同时,对于过去时光和生活经验的记忆又为创造国家文化提供了素材,这一国家文化似乎完全没有不均衡性的印记,其中国家的生命被描述成完满实现而持久的,早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转型之前就已经决定性地形成了。作为一个宽泛的能指(signifier),如果现代主义是不均衡性的征兆,那么记忆的建构也就成为最为首要而持久的认知形式。把记忆置于一个特殊地位,就是把文化/美学领域置于政治经济之上的必然结果。对记忆的追索看起来是对文化意象的内容加以特殊化,它实际上揭示了现代主义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形式与表象的问题。

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现代主义话语所遭遇的是现代性关于表象与形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危机。尽管这样的危机自始至终体现在现代化的世界当中(包括印度这样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和巴西这样苦苦挣扎的国家社会),在日本,它反映为以何种形式才能最好的反映那些产生于一成不变而又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生活经验的讨论(文学家小林秀雄^①、民俗学家今和次郎^②、户坂润),

① 小林秀雄(1902—1983),现代日本最富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也是现代日本文学批评的确立者,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他的文学派批评至今仍然深刻的影响着日本的文学批评。政治上他也被视为保守知识分子的代表。(译注)

② 今和次郎(1888—1973),民俗学家,研究民俗以外,也研究民居等,曾任早稻田大学理学部建筑学科教授。他早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也是一名画家。(译注)